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通俗讲话

(修订本)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通俗讲话**

(修订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通俗讲话**
(修订本)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625 字数137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2版

1989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284001-317700

ISBN 7-213-00012-8/D·6

定 价：2.00 元

前 言

马 守 良

这次由学潮到动乱，由动乱到北京反革命暴乱，广泛地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它促使我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通过平息这次动乱和暴乱，我们用血换来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必须一贯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全面地一贯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地结合起来。

一

当前这场斗争，不是偶然的，它是多年来斗争的继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进行了多次较量。

1978年底到1979年。当时社会上有两股思潮，一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一是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两股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北京“西单民主墙”和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相继出现，特别是“西单民主

墙”，闹得很凶，影响全国。他们丑化社会主义是“一碗泡饭加三根萝卜干”，“哪有一点优越性”。攻击党没有给人民什么好处，全国“是一片黑暗”。恶毒谩骂“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散布“马克思主义不行了，不能用，要抛弃这个老祖宗”。他们大肆鼓吹“要批判毛泽东、批判共产党、批判社会主义”。叫嚷要“反饥饿”、“要人权”，煽动闹事。有的还同台湾特务机关挂钩，甚至扬言要推翻共产党。但是，党内有的同志对这种严重的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承认这种思潮有什么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支持。有的说，两股小小的思潮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提出反右，就会妨碍批‘左’，影响思想的解放，甚至可能走回头路。”他们告诫党说，“所谓‘右’，现在万万不能当作一种了不得的倾向来反”，否则，“乾坤始转，就会变成乾坤逆转”。

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79年2、3两个月，一连发了五个文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把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在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同时，要着重批判从右的方面来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问题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1980年到1981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次抬头，其突出表现，一是文艺界有些人发表了象《苦恋》那样的一些丑

化社会主义和否定党的领导的作品；提出“修改”和“突破”四项基本原则；宣扬“党五年不领导文艺可以写出好作品来”；抵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提出文艺期刊之间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二是理论界有的人恶毒攻击我们党是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结的派别”。有的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是“老牛破车”、“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发挥优越性的”，“可以说资本主义是幸福，社会主义是祸害”。有的人鼓吹绝对自由，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侵犯人权”、“扼杀民主”、“取消言论自由”，“人民的权力异化为封建专制权力”。说什么“反革命分子如果发表反革命意见，……不等于反革命行为”。有的人散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大胆怀疑”。有的宣扬新闻、出版要绝对自由。三是在全国若干城市，出现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面对这种严重的政治是非，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

为此，党中央发了一系列文件，指出，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要进行有力的斗争，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认真帮助和批评，对于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要依法取缔。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作出了取消原宪法中关于人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取消了这个破坏性极大的制造社会动乱的工具。1981年7月，邓小平同志批评了《苦恋》和根据《苦恋》拍摄的电影《太阳和人》。小平同志指出，“象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不

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不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接着，中宣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

1982年到1983年。在理论界和文艺界，有些人背离马克思主义，宣扬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有的人鼓吹“异化是社会主义一切弊端的集中表现”，“不仅有思想上的异化，而且有政治上的异化，甚至有经济上的异化”，因此，文学和电影创作的重大主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还公开出版了集中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观点的文集等。他们用不健康的思想、不健康的作品、不健康的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因此，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搞精神污染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回事，都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的，是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1984年到1985年。这次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表现为否定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有些人到处说，反精神污染错了，“是一次不成功的文革”，“只搞了二十八天就短命，没搞下去”。有的攻击说，“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是一场居心把国家搞乱的瞎胡闹。”“你们给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丢了脸！你们真蠢！真丢脸！”有的责问，什么是自由化？这个界限一天搞不清，中国文学的繁荣就没有希望。他们否定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艺方针，否定对《假如我是真的》、《太阳和人》等作品的批评。这种思潮

也反映到党内来，在1984年12月，全国作协四大筹备期间，有的领导同志公开宣布，反对精神污染以后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不提了。在“两个不提”的思想指导下，从此，思想战线由继续批评和纠正“左”的错误观点的同时，着重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转向了集中地、一个劲地反“左”。思想文化界有些人因此说，这次可以结束经济上反“左”、理论界和文艺界反右的不协调现象了。实行这一方针的结果，造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全国思想文化界的泛滥。不少讲坛、报刊，宣传了许多混乱的东西。离开宪法，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大讲什么创作自由，什么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演出自由、表演自由，什么真理是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只是百家中之一家，等等。搞自由化的人，搞精神污染的人，十分嚣张。积极执行十二届二中全会方针的同志反而受到围攻和压制，有的被指责为“清污分子”。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再三重申，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5年5、6月间，邓小平同志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还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问题。8月，又指出，“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所谓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9月，再次强调，“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

1986年到1987年。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公开叫嚷要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他们攻击搞社会主义失败了，说什么，30年干的事情，“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这种结果是失败的”。他们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问题，这恰恰是我们中国需要的”，“这一步我们一定要走的嘛。我们现在跳了过来，可以回过头来再补课嘛。”他们丑化党，说党是黑的，党腐败了。要人们起来反对党，“你如果想在政治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那么你就必定要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企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改变党的性质。说什么“我也赞成大家入党，入党以后……至少可以改变党的颜色。我正式提出改变党”。他们还鼓吹“要实行多党政治”。他们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只会作出错误的结果，从来没有成功”。他们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煽动学生争民主，争自由。

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党的最高领导层也发生了影响。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有的同志提出删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为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这种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把我国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但是，邓小平同志的这个重

要讲话，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没有向全党传达贯彻。所以这股错误思潮不仅没有得到制止，反而导致了1986年冬天的学潮。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986年12月，中央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接着，邓小平同志又作了多次重要讲话，他指出，“凡是闹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

今年的这次由学潮到动乱，由动乱到北京反革命暴乱，是这些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和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的恶果。第一，这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阴谋活动。其策划者和组织者，主要是方励之等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由这三种极少数的人组成了所谓“运动中坚”。他们在近几年做了大量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并选择了发难时机。他们建立了所谓民主“沙龙”、“研究会”等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和活动，制造舆论，培训骨干。他们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密谋策划，要借“五四”70周年、建国4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煽起学潮，挑起事端。第二，他们提出了一整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纲领和口号，如发表《中国的希望——私有制宣言》，提出“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马克思主义等于乌托邦”，“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现在的政府是“独裁专制”，“要为民主、自由、人权而战”等等。但根本口号仍然是两个：打倒共产

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第三，他们成立了“高自联”等非法组织，建立了一套指挥系统，有前台表演的，也有幕后策划的。第四，他们纠集了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团伙，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其他社会渣滓等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仇恨的反动分子，疯狂进行打、砸、抢、烧、杀。这伙暴徒，公然叫嚷“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要用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这伙暴徒，烧毁军车千余辆，打伤解放军官兵几千人，打死几十人。第五，他们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和港台反动政治势力的全力支持。“美国之音”大肆造谣惑众，煽风点火，反华反共、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港台反动势力以及“中国民主联盟”等在国内外的非法政治组织更是直接插手，出谋划策，内外呼应。第六，当时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支持他们的动乱，并在关键时刻公开分裂党。总之，如果让这些极少数人的阴谋得逞，我们就会亡党亡国。在共和国危在旦夕之时，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采取了坚决果断措施，结束了这场长达数十天的动乱和暴乱。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第一，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根本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对立就是两种社会制度、两条道路、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对立。所以，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的实质，就是坚持还是否定党的领导，就是中国向何处去，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还是搞资本主义、实则是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股思潮，如果任其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特别是一部分青年迷失方向，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动乱的社会，改革和建设统统无法正常进行，甚至有被颠覆的危险。因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正确地坚持下去，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继承，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总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治国之根本。在这样重大的政治是非面前，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斗争的前列。这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发生和泛滥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从国内来讲，虽然剥削阶级消灭了，但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要长期存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依然存在。因此，在改革开放中必须树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念，研究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特点和规律，研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策。从国际环境来看，早在50年代中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提出，美国的政策是促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自由化。历届美国政府都继承了杜勒斯的反动衣钵，特别是利用我国对外开放条件，加紧了“和平演变”，加紧了“渗透”。我们必须树立在改革开放中反渗透、反和平演变的观念，研究国际资产阶级搞渗透、搞和平演变的特点、方式和方法，研究反渗透、

反和平演变的对策。总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长期的，至少还要斗争20年，甚至50年至70年，它存在于开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中。但是，有些同志对此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阶级斗争观念淡薄了，以致在严重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分不清是非，动摇了。我们应当很好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第三，要领导和组织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首先必须克服我们党组织自身的软弱涣散状态。实践证明，每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都与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有关，因此，这些年来，邓小平同志每次谈这方面问题时，总是提醒全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思想战线的党员干部，要认识到主要问题不在于出现不良现象，而在于我们对这些现象处置不力，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然而，小平同志的这些极为重要的指示，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地、卓有成效地贯彻，出现了多次反复，胡耀邦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赵紫阳同志则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他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削弱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这方面的教训极为深刻，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党就失去了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必须坚决改变这种软弱混乱状况。

为什么有些同志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面前软弱退让呢？首先，从认识上来说，主要是片面地接受了历史教训。我们党曾经在较长时期中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犯过“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是，问题在于怎样正确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一般地说，对待历史教训，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全面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党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例如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决议》说，“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样总结教训，就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另一种态度是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有些同志记住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面，怕重犯扩大化的错误，怕伤人，怕出乱子。于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回避矛盾、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敢认真解决矛盾，把问题捂起来，抹过去，甚至连批评二字都不敢讲。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极端。”他们主观上想取得安定团结，实际上酝酿着更大的动乱。也有的同志认为，既然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就用不着讲斗争了，讲斗争就会妨碍建设，把建设和斗争对立起来。其次，敢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自由化作斗争的同志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被扣上“左”的帽子，遭受种种非难和打击。这就失去了一大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积极分子。赵紫阳同志就是这样做的。再次，从组织上来说，就是有些同志违反民主集中制，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这也是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长治久安，必须解决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建立一套制度，来制约和监督各级领导，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而不能无限制的自由行动。我们治党治国，要靠制度，而不是靠个

人。我们必须提高认识，自觉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四，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经济搞不好，会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会翻船。思想这块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这些年来，由于赵紫阳以自由化对待我们党，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削弱了，许多地方队伍散了，阵地丢了，思想乱了。必须恢复和加强宣传政工队伍建设，要把丢掉的阵地夺回来，要把被自由化搞乱了的思想纠正过来，正本清源。要坚决妥善地整顿宣传舆论文化阵地。要大力加强对新闻出版界、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领导。要整顿和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

第五，必须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有些同志只反“左”，不反右，结果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有些同志认为，建国以后20多年的反右，把人们折腾得够苦了，一提反右，人们的神经就会紧张起来。因此，他们害怕反右，反对反右，甚至认为反右就是“左”倾。说什么“历次‘左’倾都是打着‘反右’的旗号”。但是，他们所谓的“左”，并不是真正的极左，而是把正确的东西当“左”来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这正迎合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需要。他们正是利用纠“左”的名义，从各方面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所以，“左”和右两个极端是相通的，可以由“左”走向右，也可以由右走向“左”。这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既不能以“左”反右，也不能以右反“左”。反“左”的时候，不能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反右的时候，不能影响改革、开

放。在当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充分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和危害，要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坚决的斗争。总之，要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第六，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改进我们的工作。有些人由“文革”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要另找出路，另找真理。于是他们就走到自由化的路上去。有些人借口党犯了严重错误，鼓吹取消党的领导。他们都是利用我们的错误，夸大我们的错误，否定我们的成就，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煽动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和失望情绪，瓦解人民的斗志。这并不奇怪，好人犯错误，被人利用，这是常有的事。对此，一方面要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问题是怎样对待错误。我们党历来是自己起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从而吸取教训，把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的。这正是我们党兴旺发达、光明磊落的表现。另一方面，要认真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工作，克服缺点错误。如果自己有缺点错误不改正，不但自己陷入被动，而且不能很好领导群众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这次动乱和暴乱中，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提出了所谓反腐败的口号，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但我们也要当做好话来接受。要坚持惩治腐败。腐败本身就是同四项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惩治腐败，也是以实际行动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己不正焉能正人？不惩治腐败，不发扬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我们就不能团结广大群众，就不能最大限度地缩小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市场。更何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与我

们党内、特别是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党组织政治纪律涣散直接有关，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纠正党内各种不良倾向，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强堡垒。

二

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实践还说明，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有些人借改革开放之机，发表各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如说什么改革就是“非马列化”、“非毛化”，谁坚持马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谁就是反对改革。有些同志只讲改革开放，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似乎讲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妨碍改革开放。因此，为了正确认识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有必要重温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论述。

第一，从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论述来看，“两个坚持”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前途的根本问题。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的要点是：

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基础，是党的一切内外政策的基础，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因此，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因此四项基本原则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动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改革、开放，振兴中